

爱国的逾越与压力

——略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的民族观与节操观

郑善庆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市 300071)

摘要:爱国主义是抗战时期史学著述的主流倾向。然而,这一话语本身不免忽略了史家因地域之别、著述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爱国泛化与压力问题。故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念重新加以审视,对沦陷区史家的节操观念详加考析,皆对抗战时期史家抉择问题的探讨,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抗日战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沦陷区史家;“中华民族是一个”;节操观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168-07

既有对抗战时期史家著述与史学活动的探讨,多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侧面加以论析^①;而对抗战军兴之下的史家,因地域之别、生存之需、外部环境优劣不同,所造成的爱国的泛化与压力问题,则少有述及。笔者不揣浅陋,以此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并论及沦陷区史家节操观问题,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爱国的逾越:“中华民族是一个”论争的再审视

对于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无论是从概念上的“民族”、“种族”之异同,还是从论争的过程与影响,皆有学人论及^②。然而,对于论争的真正缘起、论争中学理层面与政治层面的纠葛、爱国主义之下的利益诉求等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论争的缘起

这场论争的展开,肇始于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上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③一文。接着,费孝通写信与之商榷。随后,顾氏将此信以《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答“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之名,发表于《益世报·边疆周刊》。该文从民族学的角度对一元化的民族观提出质疑,从而促成了争论的真正展开。此文发表的初衷,本为纯粹学术性探讨,而后则不免逾越了这一范围。

继费孝通此文之后,顾颉刚又发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再行申说,使得这场论争

^① 桂遵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俞旦初. 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田亮. 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黄静. 抗战时期的史学流派[D]. 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0;杜学霞. 抗战史学研究[D].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04。

^② 周文玖,张锦鹏.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J]. 民族研究,2007(3);张雷.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论争[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2);黄天华. 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044-1061。

^③ 顾颉刚在此文中认为:“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个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入关后就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汉文化集团的一员了。……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拉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

收稿日期:2010-10-20

作者简介:郑善庆(1982-),男,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日渐扩大。此后,学术背景不同、政治立场有别的学者如傅斯年、吴文藻、翦伯赞、白寿彝、张维华、陈碧笙、马毅、陶云逵等纷纷著文立论,阐发各家观点,或赞同附和、或批评指摘、或莫衷一是,从而形成了当时一场重要的学术论争。

从表面看,此事源于顾颉刚、费孝通二人学术观点的歧异。然而,从当时顾颉刚撰写的环境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产生,实与傅斯年有莫大关联。对此,顾颉刚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述:“1939年2月7号星期二。作《中华民族是一个》,约四千字,未毕。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1]197}

很显然,顾颉刚作此文的直接动力,虽自言为乃“久蓄我心之问题”,实则源自于傅斯年对其责备的信函。傅斯年在此信中说:“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 Thai 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士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基此考量,以数事供之吾兄。一、边疆附刊之名,似可改为‘云南’、‘地理’、‘西南’等,边疆一词废止之。二、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三、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2]

观此,即可见傅斯年对“民族”、“民族主义”以及边疆词汇等概念使用的敏感性;而顾颉刚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与傅斯年的督促和提醒不无关系。其实,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傅氏对学术性词汇的警惕,早已有之。从30年代初《东北史纲》^①的编撰,到《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嘶力呼喊,决然反对战前某些北平学人所倡“民族自治”^[3]和“文化中立区”的建议,甚至不惜与其师胡适断交,皆是这一强烈爱国情结的体现。

(二)爱国主义之下的学术、政治与利益纠葛

从学理上讲,“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本身,乃与顾颉刚固有的学术理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背离和冲突。在《古史辨》中,顾颉刚曾将“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念进一步阐发为: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4]。时至1932年,顾颉刚在致洪煊莲的信中,亦认为“中国人全为炎黄子孙”的观念,应当予以摒弃,而代之以“一个合于理智的新信仰”^②。很显然,顾氏原有的观念,是否认民族一元论的;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调,多有冲突和抵牾。故而,此文政论性色彩较为浓厚,不能以纯粹的学术性论争视之。

即使如顾颉刚所言,此乃“久蓄我心之问题”,“闻之甚喜德不孤也”^{[1]206}。然而,此种态度的转变亦有远因。顾颉刚抱有“学术以救国”的信念。早在30年代初,即在北平创办“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以“楚人三户,亡秦必楚”意寓之。顾氏鼓吹抗日救国、救亡图存,不免为日人所忌恨,落入黑名单,只得潜离北平。与此同时,顾颉刚又创办《禹贡》杂志,从关注沿革地理到注重边疆史地,亦有学术以经世救国之意。后来,顾氏到西北进行考察,亲闻亲见民族冲突的惨状:“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颓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

① 具体来讲,应为《东北史纲·初稿》,第1卷《古代之东北》(1932年初版)。在此书的卷首引语中(第1至3页),即有“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间各国即非必亡之国!”之言,进而反驳“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妄说,并申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② 对于这一新的信仰,顾颉刚勾勒为:“(1)中国无所谓汉族,汉族只是用了一种文化统一的许多小民族。(2)这许多小民族未统一时是互相仇视的,但统一之后则一视同仁、不存什么隔阂。(3)因为中国有此文化,没有偏见的民族成见,故得吸收新兴的种族(如五胡及辽、金、元等)的血液而维系于不敝,否则早该灭种了。(4)中国的民族虽无偏狭的成见,但确有抵抗的精神。(5)当革命胜利时,中国民族并无寻仇的成见,仍尊重被革命者之种族的存在。”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5]这段心理历程,料必对其后来的治学、论政产生深远影响。

顾颉刚此番改弦更张,乃是出于爱国心的驱策和友人傅斯年的提醒,惟恐陷入“不爱国”的歧途。从中亦可见学术求真与爱国求用之间的无形冲突。

而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傅斯年,则不啻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5]25}。

傅斯年对此次论争,不免渗入了自我臆测的成分。他在致朱家骅、杭立武信函中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引起了民族学家云南大学教授吴文藻的不满,吴命他的学生费孝通加以反驳,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6]17};并进而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6]20}。

吴文藻乃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开创者,其弟子费孝通所著此文,本为纯粹学理性的探讨,而被称为拾西人之牙慧、有包藏祸心、为无聊之学问,实为非理性之言。吴文藻在日后的回忆中对此事多有回避^[7],我们对费孝通商榷之文与吴氏的关系,亦不得而知。故而,对此次论争的解读,主要围绕傅斯年的表述而展开。作为“史料派”的领军人物,傅斯年亦曾留学欧西,对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虽不通晓,亦不应斥之为无聊;且傅氏所主持之史语所,其下设的第四组,即以民族学与人类学属之。故而,傅氏对民族学亦当多有接触和了解。而傅氏谓吴文藻所办“民族学会”为无聊之学问,应予取缔。这种以政治手法来决断纯粹学术论争时,除却爱国情结使然外,则又不免夹杂有门户之见与派分之争的色彩了。

傅斯年却认为吴、费的言论,会在云南发生不良的影响:“因吴是中英庚款董事会派到云大去的,乃致函此会的董事长朱骝先、总干事杭立武两先生,希望将吴他调,以免发生事端。”^{[6]20}本为学术性的论争与观点的歧异,而最终诉诸于政治攻讦和个人挞伐,则为傅氏之失。可以说,傅斯年性格中的支配欲和民族心皆甚强^[8]。此次论争,本为学术性探讨,而最终却以政治权力的手段宣告终结。以今日观之,这种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9]。

顾颉刚或乃一理性的爱国者;然而,在傅斯年狂热爱国者的斥责与激励下,虽言自身亦有此意,然终在学术与爱国的天平中,倒向了爱国的一边。而在这场论争中,傅斯年对费孝通等人类学家的过激批判,除了爱国主义与纯粹学术探讨之间颇为矛盾的“张力”因素之外,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分途,也是不可避免的误解因素之一。从学科层面上讲,此次论争也是20世纪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初次交锋。中国历史上有着“殷鉴”、“经世致用”,甚而为当下政治服务的史学传统。当这一传统,遭遇到民族学、社会学等西化理论时,不免有所罅隙和冲突。同时,这一探讨的特殊环境,即抗战之时,民族危亡之秋,学术服务于政治的氛围,则决定了这一结局的不可避免性。

此一论争实则对当时的学人影响至深。后来岑家梧《西南种族论》一书,即对“民族”与“种族”的概念细加别择、特为申说。胡体乾在此书的序言中,对当时因概念而引发的爱国之争,有颇为接近本真的理解^①。然而,《中国之命运》对民族问题的解读,认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此共同之记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10]以“宗族”的概念,对民族加以涵括,使得这一论争在国家层面上定了基调,而学者后续的讨论也就不得不销声匿迹了。

① 胡体乾《关于种族名词及民族政策》中言:“关于‘种族’这个名词的使用。在过去文献中,西南各族常被唤作‘民族’。家梧先生在书中却不用‘民族’之称,而称为‘种族’。如此称法是否正当?一年以前,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主张西南各族实是种族,不该称作民族,以致将民族统一,民族独立等观念,混杂。当时即有人反对,以为种族和英文 Race 相当,是体质团体;民族和英文 Nation 相当,是体质文化团体。西南各族既是体质文化团体,自然应称为民族。……前数年曾有人把体质文化团体称为民族,把政治利益团体称为国族或族国。但是,近年来的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民族统一,民族至上等口号,已经把政治利益团体称为民族的观念,广远传播,深刻印于全国人心,不能再把体质文化团体称为民族了。至于种族一词,人类学家用以称体质团体,其范围可大可小,……所以称西南各族为种族没有大问题,此称民族较妥当些。”《今日评论》第3卷第17期,第264、265页。

时过境迁的五十年之后,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模式^[11],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有观念的固守与延伸。

二、沦陷区史家的节操观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而仍有部分史家,出于主客观的诸多因素,不得不以留守者的面目出现。与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兴盛局面相较,我们对沦陷区史家的探讨,则显得尤为薄弱。如有,也主要集中在对史家陈垣^①等少数史家的关注上。且在“爱国主义”语境之下较为一元模式的探讨,则不免忽略了沦陷区北平等地史家生存与著述的真实情形。

(一) 志守节操的潜在抵抗者

总体来讲,北平史家多以避世、杜门谢客等“潜在抵抗”的形式出现。这些史家讲僧论道,似乎有避世之嫌,实则是在生存自保的前提下,寓爱国情结于史学著述之中,消极地表达民族大义与爱国情结。

以陈垣而言,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等文,多发表于《辅仁学志》刊物中,皆为“寓民族意识于考据之文字,微旨别有所在”^[12],其“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13]216}。陈垣素以精密之考据著称,而事变后则颇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既而更为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13]302、365}。

余嘉锡的文章亦有此意。余嘉锡因著《四库提要辨证》而为学界所重,然而在北平沦陷之后,其治学路径出现了转向;相继发表了《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文,以乾嘉治史的方法,来考证古代经典小说中的人物与事迹。对此,余氏曾以“武陵桃花源渔者”自署,并以“比来年衰多病,意忽忽若有所失,不能覃思著述,惟以阅杂书自遣”^②之语搪塞。实则,其文背后寓意着深沉的爱国情结。比如,对杨家将之推崇,即言:“由是杨家将之名,遂为人所盛称,可谓豹死留皮,歿而不朽者欤?爱国之心,人所固有,后之人何乐而不为也!”^[14]以历史上英雄人物如宋江、杨家将,作为考证之对象,辨其源流、考其真伪、弘其爱国精神,实为当时史家以著文彰显爱国心的重要方式。

其他的留守史家,如身处北平的孟森、洪业、侯仁之,上海的吕思勉、周予同、周谷城等,皆能操守志节、不事敌伪。虽身处沦陷之域,仍能著书撰文、阐发史学之幽微,寓爱国气节于激扬文字之中。

(二) 节操观念模糊不清者

抗战之时的“孤岛”上海,讲学于之江大学的夏承焘,即面临北上执教燕京大学与节义操守是否相冲突的两难问题。

他在1940年接到了郭绍虞邀其任教北平燕京大学的聘书,然而,对于是否北上就任则颇为踌躇。自己难以决定,不得不求助于师友的裁夺:“三月廿二日。接孟劬翁函,谓燕京大学现状甚好,郭君聘予出于至诚,不妨一就。北平米粮贵则有之,绝食则无其事。四月十五日。得叔常函,谓予北平之行,温州尝有人谈及,皆以为瞿禅决不至到沦陷区去。……予非经商卖艺而往,如辱此身,何颜面以对学生。此节需精细问人。……四月十九日。日来为北行事甚踌躇。上午过廖忏翁、仇亮翁,傍晚过金松岑先生,问去就。廖极怂恿予行。仇谓燕京大学如由中央允其仍设沦陷区,则不妨往。金谓上海亦半沦陷区,往年燕大聘彼,彼亦有意往往半载云云。四月廿日。早晤李培恩,谈一小时,恳留甚殷,……但与燕京函札往复三两月,中途变卦,恐负郭君盛意,奈何奈何。”^[15]

夏承焘虽然精细问人,多方请教友人张尔田、李培恩、金松岑、廖忏翁、仇亮翁、叔常等人,然而在去就问题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夏氏虽知“一身去就,系四方观瞻”之理,却对北上沦陷区是否有失节

^① 方豪。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G]//陈垣.陈援庵先生全集·书信附录.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661-684;刘乃和.陈垣先生在抗战时期[J].史学史研究,1995(3);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J].北京社会科学,2007(4);许辉.北平沦陷时期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G]//张泉.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第1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118-127.

^② 《辅仁学志》,第8卷第2期,1939年12月,“宋江三十六人考序录”。后来的版本,如《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中,有余嘉锡1953年9月所作“序”,与此前“序录”略有不同,亦不见上述之语。

操,难以定夺。所谓去沦陷区,与节气之关系,夏承焘与其友人皆难以把握。而保持节操于不亏,则又是学人所最慎重者也。最终,夏承焘还是爱惜羽毛,拒绝了燕京大学的邀请。这也就是说,在沦陷区本身,不问是否事敌伪,即有辱节的嫌疑。而自身的谴责与世人爱国的压力也就隐隐增大了许多。

而史家谢国桢的节操观念则不免更为模糊不清了。《谢国桢自述》中言:“1938年春,中华文化基金会孙洪芬先生叫我返回北平典守北平图书馆的金石图书,因之又回北平任职。在这以前我本来为中日庚款基金会所办的东方图书馆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一书,因为某种关系,周作人就延聘我到伪北京大学史学系担任功课,我还误认为站在红楼上,‘楼犹此楼也,土犹此土也’,大讲其祖国的历史和‘华夷之辨’的事迹,实在是失去了民族气节。因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勒令我辞职,我只有承傅增湘先生的好意,经他介绍我到川帮私营大中银行聊司笔札,并协助傅沅老编纂《绥远通志》一书,这也不过是混些事儿和掩耳盗铃而已。这些事情我不说,人们也会知道,我不如坦白地交代出来,作为一篇反面教材,供同志们毫不留情地批判而已。”^{[5]383}

谢国桢身处“伪北大”讲席,依然大谈“华夷之辨”;后经袁同礼的提醒才幡然醒悟,辞职他就。谢国桢对此事可谓坦白,亦因此而愧疚不已、郁郁终生。而更多的学人,对此段经历则选择了沉默和内心的自我谴责。

更有史家因节操问题被人毁谤,而不免遭受误解与非议。

以顾颉刚的弟子童书业而言,亦有因投稿不慎而为投敌者所欺骗的经历。1940年,亲日分子汪馥泉在上海创办《学术月报》,向童书业约稿。童氏还懵然不知汪馥泉已为汉奸,乃爽然应允,“从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抽出《三皇说之起源及其演变》一篇及《古史辨》第七册序送去发表,后又从《春秋史》讲义中抽出一篇以顾颉刚名义发表在《学术月报》上。”^[16]此举不幸中了汪馥泉的诡计。

此事,顾颉刚亦受牵连。“昨锡永告我,谓渠在渝见卫聚贤,卫谓我与童书业已投降伪组织。告履安,履安曰:‘然,卫某在沪宣传汝已得伪组织五万元!’呜呼,卫之造谣一至此乎!……若予到沪,造谣者必造谣,买收者必购买,恐将迫予如王开疆之蹈海以自明耳。”^{[1]349-350}后来,顾颉刚不堪造谣之压力,不得不在报刊上登一启事,以证自身清白。而童书业则为避文化汉奸的纠缠,决意离开上海。

不事敌伪、保持节义与操守,成为当时沦陷区学人的一个重要压力。除了不时遭受敌伪的侵扰和强迫外,更多的学人则在“节操”的衡量与评判上,少有一致性的观瞻,甚而出现在今日看来已有失节之嫌,而当时并不自知的“怪象”。实则,在当时纷乱横生、真假难辨的抗战之时,这一灰色地带,学人本身很是难以拿捏与辨别的。

(三)地域有别、爱国叛国异趣者

除却学人地处沦陷区本身所蕴含的“不爱国”的色彩外,所处沦陷区地域的不同,也在“事伪”之事上面临着不同的压力,从而形成迥然有别的评判。仅以沦陷区北平与香港的容庚、陈君葆等学人为例,较而论之。

众所周知,周作人在北平沦陷期间,作为留守北平之教授,因曾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等伪职,节操有亏,最终被判定为“文化汉奸”。而另外一些学人,如史家容庚的遭遇,则更值得玩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停办,容庚转而任教于伪北大,此间著有《卜辞研究》等著作数种,并成功阻止日人假借平汉线文化史迹调查以劫掠文物的企图。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即对伪北大教授一律摒弃,不予录用。容氏对此强作争辩^①,但亦无果,且被傅斯年斥之为“无耻汉奸”,最终被迫离职他就。

香港沦陷后,学人陈君葆留守香港,曾为日本所占冯平山图书馆的雇员,在日本军官肥田木等监督之下,负责史籍整理与搜集工作^{[17]55}。究其缘由,实与保护冯平山图书馆所藏的珍本古籍有关。陈氏亦自言:“冯平山图书馆的事本来我可以置之不理的,但为着中央图书馆的一批书,为着顾全别人,我竟动

^① 容庚在陈述自身未南下的原因时,则言:“庚亦自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燕大复校于成都,同人多西去,八妹媛亦从而西。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幽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强,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2页。

于一‘义’字而不顾一切了。”^[17]⁴⁵此间，先生亦保护陈寅恪等著名学人安全离港，投奔大后方。战后，先生因追讨书籍、保护校产之功，获英国皇室颁发 O. B. E. 勋衔，友人李幼成赞曰：“民族异宝得以巍然不坠，此功此德何止胜造七级佛图已也？……传曰：不有留者，谁守社稷，若斯使命，卒底完成，责任之重，磨折之深，应付之苦，境况之危，可从想见。”^[18]且被誉为爱国人士。

且以事“伪职”而言，陈君葆、容庚两人，皆不免有之；而两人对保存中国文化之努力，则亦有心为之。而后世评判却迥然有别：一被目之为爱国人士，一则被斥为“无耻汉奸”。究其原因，不仅沦陷区本身即潜在含有“非爱国”的嫌疑与压力，且在同为沦陷区的北平与香港，亦有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判若两端的评价标准。则爱国主义之下，学人所面临的不同际遇，或又为诚可思之的问题。

（四）曲衷隐忍、难以言说者

史家金毓黻的遭遇则更为隐晦和曲折。从金氏的个人经历看，东三省顷刻沦陷时，因不及出逃而遭囚禁，被迫出任伪职，后于1936年假借日本逃至国统区^[19]。此段沦亡经历，亦成为金氏不可言说的隐痛。他在日记中，对其友人文仲公的遭遇不免扼腕叹息^[20]⁵⁹³⁶。

金毓黻虽记述其友人之经历，扼腕其不幸遭遇，实乃对沦亡之下东北士人的申述。究其深意，则更为喻其本身，对世人苛责之“节操观”的一种深刻反思，并对所谓“失节者”的同情之理解。

不惟如此，金毓黻的《岳飞之死与秦桧》一文，亦潜藏着这一信息，以致于“编辑后记”中特加申说：“《岳飞之死与秦桧》一文，当是大家所极欲一读的，但读至中间颇使人这样担心：金先生是要替秦桧辩护吗？然而读了后就知道金先生不但没有给他辩护，反更把杀死岳侯的谋主指明了，这真是前人所未发的至论；至于博徵推断之详细正确尚是余事。”^①以免读者误解。

另外，金毓黻在述及宋代降金者张邦昌、刘豫，降元者留梦炎时，亦评论道：“古来降敌偷生之人，未尝无故国之思，终致一往而不返者亦自有故。张邦昌、刘豫北于北宋之末为金人利用，以立伪楚、伪齐。邦昌犹有羞恶之心，即金兵退去即迁政于宋孟太后，尔时，王时雍语邦昌：‘夫骑虎者势不得下，所宜熟虑。’邦昌不应，后李纲为相，建议诛张，因而赐死。刘豫既为帝，宋宰相吕颐浩以书勉豫忠义。豫曰：‘独不见张邦昌乎？业已然，尚何言！’豫之不能反金为宋，以邦昌前事为鉴故也。南京之亡，文丞相天祥被掳至燕，宋降臣留梦炎说其降元，天祥骂之。王积翁欲合降臣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梦炎之意谓天祥被释，窜回江南，号召遗民，宋可复兴，元亦未能久保中原，届时必治梦炎等叛国之罪，而不得保其首领。其意犹刘豫之意也。虽然豫如反金为宋，终不免蹈邦昌之覆辙。”^[20]⁵⁹⁷³⁻⁵⁹⁷⁴

此论颇有深意在。金毓黻此文对“降人”、“佞臣”、“武人”之态度，能有如此透彻之分析，实与作者当时的经历与心境有莫大关系。东北沦亡后，金氏迫于压力，曾任东北伪政府职，而后冲破阻隔，转至国统区任教。然此段经历亦为时人所讥，认为有失操守。

先生对名节视之甚重，而终不得解；又因曾经历东北沦陷区的愁苦时段，故对沦陷屈节之人，实能报以“了解之同情”，而非仅仅在爱国情绪之下的一味斥责。故而，金氏在论述历史人物时，不时暗喻当下被忽略的伪东北官员、学人。认为他们亦多有爱国之心，与颀颜于日本人的卖国者，实有迥然之别。而抗战胜利后，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激涨，对此多不加以辨别；先生为之郁郁，故有上述之论。观此，较之于狂热爱国的傅斯年，两人对“降人”之理解和认知实为迥异。

三、几点思考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家，与其他知识分子相较，不免背负了更多的爱国压力：他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是历史事件的撰述者，更为洞悉华夷之辨、恪守节操的重要性。然而，战时的爱国主义、民

^① 《文史杂志》，第1卷第6期，1940年6月，第66页。金毓黻在此文中言：“宋代之传统政策，一为严防武臣跋扈；二为以文臣制武臣。所谓士大夫之政治，亦由此传统政策演成。……宋代之权臣，皆非能自擅其权，乃窃弄天子之权，以自作威福耳。借使高宗赦免秦桧之相位，桧必俯首听命，无力以与之抗。宋之诸相，大抵如此，终宋之世无奸相逼君之事，即由如此。然则桧之杀飞，未尝取旨于高宗，岂其然哉？盖高宗所畏恶者，厥惟武臣跋扈，桧周内飞部下告讦以证其为跋扈，是为飞不免于死之主因；杀一以儆百，亦高宗之所愿为也。”

族主义话语,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史家本身所面临的生存压力、门户之见等诸多问题,使得对战时史学的探讨难以全面深入和有效展开。

首先,抗战军兴之际,民族至上观念的盛行,历史学与民族学学科话语的分歧等等,皆使得“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人言人殊。胡适曾言:“我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21]而今,民族主义与学术之间的纠葛,成为难以逾越的内容。此次“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已经逾越了纯粹学术性探讨的范畴,综括了学科之间的隔阂、民族情绪与纯粹学术性探讨的潜在矛盾、爱国主义背后的利益冲突等诸多问题。

其次,仅以地域本身而论,身处沦陷区的史家,与身处“爱国之地”^①的西南、西北地区的史家相比,不免面临着更多的“节操”压力;史家身处沦陷区本身,即潜在地暗含着爱国不力、操守不谨,甚至是有失操守的嫌疑。而许多学人在生存压力、日伪诱逼等诸多因素下,任教于伪北大等校,则更被视为失节之举了。而当时的亲历者则更多认为“这种事情往往是暧昧的,不是黑白之间的选择,而是灰色的深浅。”^[22]

最后,沦陷区学人的抉择,变得更为多元化。有人选择了坚忍的归隐,有人选择了消极的抵抗,有人则是倾向犬儒主义的屈节事伪,还有一部分人则因不经意的丧失节操而饮恨终生。故而,对于战时史家的民族观、节操观问题探讨,更应该“重新放入那段布满约束与选择的历史中去,摆脱过去过于简单极端的两种观点”^[23],并对这一复杂的现象条分缕析。惟有如此,方可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问题,有一个更为接近本真的理解和诠释。

参考文献:

- [1] 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第4卷[M]. 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2007.
- [2] 傅乐成. 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G]//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七)·书信.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206-207.
- [3] 傅斯年.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G]//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27.
- [4] 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M]. 古史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99、100.
- [5] 顾颉刚. 顾颉刚自述[G]//高增德,丁东编. 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25、26.
- [6] 傅乐成. 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上)[J]. 传记文学,第2卷第5期,第17页.
- [7] 吴文藻. 吴文藻自述[M]//高增德,丁东. 世纪学人自述.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405、406.
- [8] 李扬眉. 学术社群中的两种角色类型——顾颉刚与傅斯年关系发覆[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92-99.
- [9] (美)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 [10]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M]//秦孝仪主编.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专著.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6.
- [11]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12] 益世报·读书周刊:第3版[J]. 1946-12-27.
- [13] 陈智超. 陈垣来往书信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16.
- [14] 余嘉锡. 余嘉锡文史论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97:461.
- [15] 夏承焘. 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二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87-194.
- [16] 童教英. 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
- [17] 陈君葆. 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1941—1949)[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8]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陈君葆书信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46-149.
- [19] 金景芳. 金毓黻传略[J]. 史学史研究,1986(3):71-74.
- [20] 金毓黻. 金毓黻文集[M]//编辑整理组校点. 静晤室日记(八). 沈阳:辽沈出版社,1993.
- [2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 胡适来往书信选[M]. 北京:中华书局,1979:497.
- [22] (美)陈毓贤. 洪业传[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48.
- [23] (法)卢瓦耶. 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M]. 张文敬,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① 战时的傅斯年反对陈寅恪在广西大学逗留教书,阐述理由时即言“至少此(四川)为吾辈爱国者之地也”。见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